

■新作聚焦 范稳长篇小说《太阳转身》

光荣与梦想的传奇

□李耀鹏 孟繁华

范稳是当代长篇小说创作的圣手，多年来他以《水乳大地》《悲悯大地》《大地雅歌》《重庆之眼》《吾血吾土》等建构了绚丽多姿而坚不可摧的小说王国。范稳始终凭借着冷峻理性的目光和立场坚定地捍卫和苦心经营着他的小说疆域，他的小说致力于史诗性的追求和开创新的美学质地，在历史、地域和文化的多重影中铸就了斑斓的文学图景。长篇小说《太阳转身》是范稳壮丽转身的最新收获，彰显了范稳作为优秀小说家的胆识和谋略。小说将目光聚焦于当下的时代和生活，透过一个迟暮的英雄警察、一宗跨越千里的绑架悬案、一个古老山寨的现代之旅，将哀婉动人且不乏昂扬斗志的脱贫攻坚史诗娓娓道来。

小说《太阳转身》中，范稳并没有简单地正面书写脱贫攻坚的艰难进程，而是选择独辟蹊径地写出了脱贫攻坚的荡气回肠的“前史”。在这样的意义上，《太阳转身》无疑是具有“冒险”意味的挑战性写作。“不确定性”是当下中国最大的特征，范稳以其敏锐的历史和现实的感知力发觉到时代的瞬息变幻，城市与乡村、人性的澄明与幽暗、个人的生存与死亡总是在不经意间发生着变化。范稳希冀记录下历史前行进程中那些温暖感动的瞬间和光影，用文学的方式寻找自信和力量，发掘出平凡世界中的英雄，为后来者奏响凯旋的乐章。脱贫攻坚是一场没有硝烟的“战争”，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实现这种神圣的目标是属于每个人的光荣与梦想。我们需要一种驰骋疆场浴血奋战的无畏的英雄精神和情怀，唯有如此，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才能够得以实现。在骨子里，范稳襟怀理想和天下，他的血液中浸润和流淌着中国传统士大夫文人“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的品格，无论在何处都心系国家和人民，是真正的“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的风范。小说《太阳转身》中潜藏着一股英勇无畏的气息，正是这种无畏的力量带给我们前行的勇气。在《太阳转身》的后记《想去种一块田》中，范稳曾坦言：“我们常去慰问那些从战场上下来的新时代‘最可爱的人’，他们为国征战的荣耀感和自豪感让我至今难忘，我也重新认识了边疆、民族、国门、边境线这样一些不仅仅是人文地理意义上的概念，他们会使人陡升国家认同感、民族尊严感以及作为一个中国人的自豪”。范稳将这种情感赋予到《太阳转身》中那个有着传奇人生的卓世民身上。

小说中的卓世民在战争时期是功勋

赫赫和壮怀激烈的英雄，和平年月里又成为家喻户晓的刑侦战线上的豪杰，“他的一生戎马倥偬、身经百战，无论是在战斗的岁月还是在和平年代，他就是不断书写传奇的那一类好汉，死神常常都绕着他走。”在卓世民的生命哲学中，“波澜壮阔的人生是显英雄本色，可风平浪静的日子才是生活。”然而，卓世民毅然果断地选择了人生而放弃了生活，退休后的他可以悠然自得地享受着云淡风轻的凡俗日子，可是那种在枪林弹雨和刀光剑影中磨砺熔铸的精神品格使其仍然要为国家人民殚精竭虑，正所谓“位卑未敢忘忧国”。农村留守儿童岳阳的离奇失踪打破了卓世民原本宁静的生活，他与志同道合的战友兰高荣告别了舒适安逸的城市，来到了他们曾经共同战斗过的杨家寨和南山村，在这里，他们重温了随时间而逝去的万丈豪情，他们要开辟新的“战场”，进行新的“战斗”，携手南山村的贫苦民众开创新的生活诗篇。卓世民不畏强权和恶势力，他以顽强的毅力经历了艰难的寻找，最后终于惩恶扬善将岳阳解救，在与歹徒的奋勇拼杀中走完了他辉煌荣耀的生命历程。作为一个永不言败的孤胆英雄，卓世民无私地奉献了自己全部的青春、理想和热血，用生命的光辉照亮了我们行进的方向和道路。卓世民代表着一种铁骨铮铮的硬汉精神，范稳将这种精神气质镶嵌到脱贫攻坚的历史征程中，借以凝聚、唤醒和感召创造新时代的中国力量。

范稳在一篇访谈中直言道：“我想做一个有血性的书写者，尤其在战争年代，我们做的每一件事，都决定我们国家是否能生存。我们需要弘扬的，是敢于面对强敌侵略的勇气，这是任何一个民族和国家必须承担的。我也被很多评论家说有一种英雄情结，我觉得这是人的高贵品质。英雄情结是一种风范，只有大国才能诞生。”正是这种无处不在的英雄气魄增强了小说内在的情感张力，使得范稳在同代作家的同类题材写作中脱颖而出。王国维在《人间词话》中指出：“词以境界为最上。有境界则自成高格，自有名句。”在王国维的理解中，诗人的人格是创造境界的首要条件，境界的高格便是高尚伟大的人格。范稳在《太阳转身》中同样创设了属于他的小说境界，一种思无疆而意无穷的高远之境，这种小说之境正是其人格风范的生动映现。表面上看，范稳的新作《太阳转身》似乎断绝了与其此前创作中形成的传统，但是在信仰、信念和意志的维度上，《太阳转身》作为一种思想的“补遗”却是一脉相承的。



在《太阳转身》中，范稳希冀记录下历史前行进程中那些温暖感动的瞬间和光影，用文学的方式寻找自信和力量，发掘出平凡世界中的英雄，为后来者奏响凯旋的乐章。

《太阳转身》是为人民代言和立传的“生活之书”，是新时代的“人的文学”，脱贫攻坚意欲实现的是为挣扎于底层的民众带来新的希望，如何解决中国农民在现代化进程中遭遇到的现实和精神困境是无法逾越的历史题中之义。《太阳转身》中的依建光和韦小香夫妇、杨翠华、赵四毛、曹前贵等都因为贫穷而“转身”走上了不同的人生道路，他们向往集结着权力和欲望的城市，城市是其最遥不可及的梦幻。依建光和韦小香迫于生活的窘境而无奈将自己的孩子出卖给褚志和林芳；赵四毛因为饥饿走上了犯罪道路；曹前贵为了身患癌症的妻子而贩卖人口；杨翠华则是由于丧子的痛苦产生了畸形扭曲的病态心理。事实上，面对他们的人生际遇，我们无法在道德和伦理的意义上审视和批判，他们的罪与罚是对当下时代最有力的回响和直击心灵的叩问。因此，他们内心如此强烈地渴望和憧憬着：“在北回归线上，在太阳转身的地方，让我们贫穷的村庄也华丽转身，脱贫致富。”这种渴望在小说中主要体现在曹前贵对于修路的执着，他始终以愚公的毅力和精神要为南山村修建一条通向文明和现代的道路。战争年代，曹前贵曾是卓世民的得力战友，他身上有着一股永不言败的血性和韧劲。在他看来，贫穷并不可怕，可怕的是人们缺乏战胜困难的信念。所以，他自我勉励道：“对于那些生存条件险恶的村庄，像南山村这种被判了‘生态癌症’的村庄，再苦再难，我们也要像当年打仗一样，向贫困开战。‘生态癌症’不可怕，可怕的是人没有了脱贫攻坚的干劲，缺少了为国戍边的精神。”

实际上，小说中的道路具有现代意义，它象征着光明和希望，是文明与愚昧、乡村与城市之间的桥梁，小说中伴随着曹前贵开掘道路进程的是脱贫攻坚的不断胜利和深入人心。此外，范稳在小说中还颇有深意地提及民族的创世神话，通过汤谷寨的《祭祀太阳古歌》的歌谣讲述了创世神布洛陀以拙朴原始的力量开天辟地的壮举。这则神话看似赘余无用，实际上却寓意深刻，成为了小说的点睛之笔。壮族人的祖先最终找回了自己的太阳女儿，太阳的转身离去，不是真正的离开，而是回归。也就是说，我们正在经历和进行的人类历史上前所未有的脱贫攻坚事业，必将如那转身归来的太阳一般，带来爱和希望。如同小说中所呈现的，依建光成功获救、林褚承得以医治、依建光迎来了人生的高光时刻，南山村的脱贫攻坚事业如火如荼地进行。卓世民虽然悲剧性地离开了，但他就像壮族神话中的太阳，把光明和力量留给了世人。

范稳的《太阳转身》是“新人民性”写作的典范，这部新作以新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美学原则内在地接续了《三里湾》《暴风骤雨》和《创业史》等开创的文学传统。在范稳内心深处，“不论是写现实题材还是写历史题材，作家面对创作客体时，首先要真诚、谦逊，要深入到生活一线，虚心向生活学习。其次要心存敬畏，敬畏历史，敬畏文化，敬畏人民，敬畏生活，要有勇气去再现实生活的真相。”如若没有足够的真诚和敬畏之心，无法写出《太阳转身》这样的厚重之作，在脱贫攻坚的文学战线上，这部长篇新作具有的价值和意义无疑是巨大和不可估量的。

■新作快评 林森中篇小说《唯水年轻》，《人民文学》2021年第10期

潜水与换气的隐性对称

□郑纪鹏

面对大海，2018年，小说家林森曾呈上他的中篇小说《海面上》（《人民文学》2018年第9期）。在这篇小说中，“老一代渔民与新生代渔民的生活与精神上的隔阂、传统海洋文化与现代城市文明的碰撞，丰富了我们对于经略海洋、逐梦深蓝的认知”。时隔三年，林森延续《海面上》中对海的深挚，呈上了另一部海洋题材的中篇小说——《唯水年轻》。到目前为止，《唯水年轻》和《海面上》一起，构成了林森的小说创作中涉及海洋文学题材的中篇小说双壁。

在《唯水年轻》中，作为水下摄影师的“我”从一开始就以对抗的姿态出现：对抗家人尤其是父亲，无视他们的警告，从小就喜欢纵身一跃，浸润在海水之中；对抗庸常生活的枷锁，选择了水下摄影的工作，从岸上的“牢笼”中脱身，潜入澎湃的海水；对抗深水的压强和稀薄的氧气，在水下摄影时，常常独自一人；对抗家族中的男人与大海交错的命运，从曾祖父到祖父，再到父亲，或者借着大海消失（曾祖父远渡重洋，去国未归），或者消失在海中（祖父在海面上死去，他的死如生门般得无解），或一开始远离大海最后也想潜入海水看看“水下龙宫”（父亲对海的态度转变），而“我”偏偏潜入海水，去搅动所谓的命运；对抗流动的时间和历史的意外，以摄影的方式记录下因明朝时的强震而深陷海中的海底村庄的现状……

细细揣摩不难发现，小说中的“我”的种种“对抗”，不是一种拒绝的姿态，而是以拥抱的姿态融入大海，尤其是融入海南的这片海。诚然，在这片海中定然有某件被遗忘的东西，等待他去打捞。这到底是什么？小说中没有明说。作为读者，我行使了大胆猜测的权利，权且暂时将小说中的“我”想要打捞的东西推定作为一种“隐性对称”。他以摄影师的身份，在世界各地的海域兜兜转转，百转千回还是回到了渔村，因为“水下龙宫”诱惑着他——因为“以沙滩为中轴线，水下龙宫和岸上村子，是相互对称的”。

相互对称这种独特的关系，成为《唯水年轻》中一种独特的结构。这里所指的结构，不仅仅体现在形式方

面，更重要的是内在的结构，也就是我所推定的“隐性对称”关系。在小说中，几乎处处可以看到这样的对称，比较明显的有“海面和岸上”“水下龙宫和岸上村子”“我辈和祖辈”“传统和现代”“历史和现实”“实物和照片”“活人和死人”“可以出海的男人和不可以出海的女人”“做海的人和不做海的人”“常态的生活与例外的生活”等。这种奇妙的物理结构和文学结构，类似国家游泳中心“水立方”的建筑结构。作为文学叙事作品的《唯水年轻》和作为体育场馆建筑的“水立方”一样，是立体结构的呈现。“水立方”是一个关于水的建筑，水在泡沫形态下的微观分子结构经过数学理论的推演，被放大为建筑体的有机空间网架结构；《唯水年轻》则是一部关于水的文学叙事作品，与实体建筑不同，这部小说将水在泡沫形态下的微观分子结构（在文本中体现为“隐性对称”关系）经过文学化叙事的推演，被放大为文学叙事作品本身的有机空间网架结构。所谓的有机空间网架结构就是立体的结构，同时在文学的意义上，也是一种流动的结构，一种蓄势待发的结构。

在《唯水年轻》中，立体即代表着现实映照文学所呈现的多个面向与可能。这部篇幅不长的中篇涵盖了诸多与海南相关的元素：有海南省海口市演丰镇海域的奇观——中国唯一的海底村庄。据记载，明朝万历年间因地震沉陷，形成了现在演丰镇海域的72个“海底村庄”；有海南的守望妇（小说中曾祖母的形象）；有水下摄影与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背景下的旅游开发；有海南人下南洋的历史与渔村的变迁和发展，等等。这些元素以大海为介质，在《唯水年轻》中形成多维视角，读者可以借此回顾历史沉淀的层次，亦可借机观照现实的种种变幻，甚至还能以此为基点，想象海南未来的某些可能。

至于《唯水年轻》中流动的结构，则更为内化一些，我所指的是这一文本在叙事的过程中自然流露出来的动态，是一种流动性的叙事，同时也是一种带有时间维度的书写。无论诗人还是小说家，只要拥有自我意识并尝试去书写动态的时间，都有一种言说的无力感，喟叹描摹时间时的无能为力。《唯水年轻》中，时间得以在文

字中自如流动。借用小说尾声，作为水下摄影师的“我”在《“唯水年轻”摄影展前言》中面对时间的独白，可以清晰地看到时间流动的脉络：村庄沉入海水，是“以一种方式，抵抗着时光的腐化”。在我看来，“层层传说覆盖了记忆。人们出生，活着，然后死去”。所以，“当我潜入水中，看到海底建筑，便觉得，这片海，确实老了；可荡漾的水纹天光，又那么年轻”。值得注意的是，《“唯水年轻”摄影展前言》已经被“我”写出来了，但因为种种原因，展览迟迟没有开幕。直到小说结尾的最后一个字和最后一个标点符号那里，依然是呈现出流动的状态。借用一句描述杜拉斯写作状态的活来形容这种时间流动的状态，即在这样的叙事中，时间和大海一样隐藏着“愚而未决的激情”。

《唯水年轻》中所具备的蓄势待发的结构，其实是一种外部结构。它串联起林森本人的小说创作谱系：从游走在现代与传统之间（《小镇》），到归乡的文学写作中以“海岛主义”姿态突围（《暖若春风》），进而形成了带有自身特点的以及兼具乡土传统文化的“海岛气象”（《关关雎鸠》），现在则是《唯水年轻》和《海面上》构成的海洋文学题材中篇小说双壁，加上长篇小说《岛》，有意识地直面并系统性地处理城乡发展和再平衡的变与常，并以海南渔村及大海为样本，从中反思现代化进程与海洋文明的碰撞，追问碰撞之后新生的可能性。这样的小说创作谱系不是自发且随心所欲的，而是有自我意识和现代意识的；不是单行线性的，而是网状结构互相交织作用的。也正是因此如此，这种写作才为海南的海洋题材文学创作提供了一种可供操作的参考意义。

从微观之处看，林森的中篇小说《唯水年轻》中的“我”，在潜水与换气之间，存在着隐性对称的关系；从宏观角度看，乡土中国的文学叙事和中国海洋文明的文学叙事亦存在着隐性对称的关系。今后，中国海洋文明的文学叙事隐性基因如何趋于纯合，才将其决定的性状表达出来？这是每一个关注并有志于发展中国海洋文明的文学叙事的人需要不断思考并寻求解答的一个本质性的问题。

■关注

随着全球化的深入发展，世界各国在政治、经济方面的联系愈加紧密，文化交流也日益频繁。在充满迷思的“全球”表述中，我们被许诺了一个无中心、无边界、人人可以自由参与的绝对空间。按照美国达姆罗什（David Damrosch）的说法，这个空间中的“世界文学”具有相当的流动性，它并非各国文学在全球语境下交汇融合的“美丽新世界”，更多的是通过翻译实现的文本的旅行，它赋予了“世界文学”“足够大的世界和足够长的时间”（《什么是世界文学》）。在全球化和世界文学语境下，不同文学的地方经验反而显得越来越重要。如何以地方性的经验表达，加入到全球化或世界文学的对话中，也是中国文学与江苏文学面临的挑战。

一般而言，地方性经验往往会成为某类文学、某个作家的身份标志，比如福克纳（William Faulkner）与美国南方文化、霍桑（Nathaniel Hawthorne）与基督教文化、哈代（Thomas Hardy）与伦敦乡村文化、沈从文与湘西文化等等。明清以来的江苏文学与文化形成了一个极丰沛的传统，这个传统在当下的呈现，本身就是一个极具张力的存在，涌现了陆文夫、高晓声、赵本夫、苏童、叶兆言、毕飞宇、范小青、叶弥、鲁敏等等一大批优秀作家，他们的作品多多少少都烙上了江苏地方经验的标志。这种地方经验，也成为江苏当代文学与世界文学对话的重要资源。江苏当代作家的作品从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开始，便不断地被译介到海外，并引发一定的关注与研究。江苏当代文学作为中国当代文学的一部分加入了世界文学的流通体系，为全球化语境中中国文化身份与文化形象的构建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江苏文学的海外传播一直以来以纸质出版模式为主，包括了文学选本、单部作品集、单行本、期刊杂志等形式。这些作品除了少量由《中国文学》杂志、“熊猫丛书”策划出版外，大多是由海外世界的译者、编者、出版商出于个人趣味、商业利益等原因主动译介的。原来的译介更多地是作为学术出版，服务于学术研究，21世纪以来商业出版的比例才显著提高。仅以英语世界为例，在马汉茂（Helmut Martin）和金介甫（Jeffrey C. Kinkley）主编的《当代中国作家自画像》（*Modern Chinese Writers: Self-portrayals*）、王德威（David Der-wei Wang）和戴静（Jeanne Tai）主编的《狂奔：中国的新锐作家》（*Running Wild: New Chinese Writers*）、卡罗琳·肖（Carolyn Choa）和苏立群（David Su Li-qun）主编的《中国当代小说精选》（*The Vintage Book of Contemporary Chinese Fiction*）、石峻山（Josh Stenberg）编选的《伊琳娜的礼帽：中国新短篇小说》（*Irina's Hat: New Short Stories from China*）等著名选本中，均收入了不少江苏作家的作品。陆文夫、高晓声、苏童、毕飞宇、叶兆言等人的代表作得到比较全面的多语种的译介，特别是陆文夫的《美食家》曾经风靡欧美，成为中国当代文学最具世界影响力的文本之一。

与此同时，随着技术的发展，电子出版和网络传播成为更具开放性、便捷性的传播模式。不仅原来纸质形式的江苏作家作品的英文译本纷纷推出电子版，而且又出现了不少专业的海外传播网站，比如“无界交流”（Words Without Borders）、“纸托邦短读”（Read Paper Republic）等，以电子出版的方式译介了苏童、毕飞宇、叶兆言、范小青、叶弥等江苏作家的作品。特别值得一提的是，2013年西蒙·舒斯特出版社与译林出版社达成协议，双方合作推出电子版的当代作品译本。目前已出版的书目中，就包括了苏童的《另一种妇女生活与三盏灯》（*Another Life for Women and Three Lamps*）、叶兆言的《别人的爱情》（*Other People's Love*）、《我们的心多么顽固》（*How Stubborn Our Hearts*）、《花影》（*A Flower's Shade*）等作品的电子版。作为西方老牌的经典出版公司，西蒙·舒斯特出版社对江苏当代文学作品的电子化译介，能够帮助江苏文学更快速有效地吸引更广大的西方读者。

江淮大地、秦淮人家、市井小巷、曲艺美食、街道河流等地方文化因子，伴随了一代又一代江苏作家的成长，深深烙印于其生活经验与文化记忆中，为江苏作家的想象与创作提供无穷的滋养。这些具有独特个性的地方文学作品的译介传播，显然更加有利于实现以世界文学的动态多样发展为背景的异质文化间的互识、互证、互补。从目前的江苏文学海外传播来看，传播主体大部分是中国文学研究者，其中不乏资深的学者或翻译家，如葛浩文、王德威等人。葛浩文翻译的《米》《我的帝王生涯》《河岸》等堪称经典；王德威的评论《南方的堕落与诱惑——苏童论》《艳歌行——叶兆言论》等，更是传诵久远。这些具有双重甚至多重文化背景及语言能力的汉学家为江苏文学与中国文学的海外传播做出了极大的贡献。当然，当代文学在海外的传播效果如何，还要看作品是否在海外引起专业的文学批评、是否有主流媒体的推广、是否在市场机制的导向下被反复再版，从这几方面来考量，目前仅有陆文夫、苏童、叶兆言、毕飞宇等人的作品得到较为广泛的传播，而鲁敏、叶弥、朱文颖、荆歌等优秀的中青年作家也开始得到一定的关注。

从江苏文学的海外传播来看，地方性经验在不同历史阶段、不同作家的作品中均有不同的表达，因而发现并译介、推广具有不同“声音”的江苏作家作品进入西方市场，可以进一步整合和提振江苏文学，避免由于城市化发展带来的“均质化”表达，而江苏文学地方性经验的广泛传播，也有助于深化海外世界对中国的认知，从而推动中国文学与世界文学的对话与融合。应该说，江苏文学地方性经验的书写、地方文化的表达有着丰富的呈现方式，目前在西方文学传播程度相对滞后的中青年作家，如叶弥、朱文颖、戴来等人的作品亟待更多的译介。因此，我们应该充分利用“中国文学走出去”的良好契机，发挥海外汉学家作为译介主体的作用。他们介于两种文化之间，对发现、评介、翻译优秀的中国文学作品有其独到之处，他们的评论、译序、译后记等作为副文本，配合着正文本，引领并强化了译本在西方文化语境中叙事功能。只有更多的海外汉学家的关心与参与，江苏文学的海外传播才大有可为。与此同时，可以进一步加强中外合作，建立“评估-反馈”机制，动态性地追踪分析江苏作家海外传播的路径和策略，从而助推江苏文学更好地融入世界文学场域。

在全球化语境下，像江苏文学这样有着悠久传统的区域性经验书写，显然有着自己的独特价值。大量像江苏文学这样具有地域特色的优秀文学作品的翻译与传播，正是全球化时代完善中国文化身份、推进跨文化对话、增强中国文化竞争力的有效方式。具有地域特色的优秀文学作品的国际流通，也可以进一步推动以翻译为中介的世界文学的动态生成。有鉴于此，我们必须思考两个方面的问题：一方面是如何通过文学的手段不断推动海外读者对地方性经验的认同与接受。江苏文学传统的一个重要基础就是市民文化、市民阶层，是长期以来不断浸染而形成的生活方式，但是随着江苏经济的高速发展，城市的急剧扩大，江苏的国际化程度的大幅提升，新兴起的市民读者的阅读趣味更多地走向了均质化，与其他地方的读者差异性越来越小，这无形之中制约了江苏文学地方性经验的表达。因此，江苏作家如何一方面立足当下以文学的方式记录和表现时代的巨变，另一方面又坚持江苏文脉，彰显江苏文学的叙事特色，这将直接影响到未来江苏文学与世界文学的对话。另一方面是如何以丰沛的地方性，抵抗或消解翻译所能带来的平面化。地方性经验往往带有某个作家或某部作品不一样的“声音”，但是这些带有浓厚地域色彩的作品一旦被标准化的英语或法语或其他语言推向世界，他们的时空距离和地方色彩也消失殆尽。因此，江苏作家如何在内容、叙事、风格的层面上更好地传达与保持江苏文学的地方性经验，以此抵抗翻译可能带来的损害，这也是未来江苏文学面临的挑战之一。

走向世界的「文学苏军」

□季进

